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

主题创作、主题出版是新时代儿童文学领域的重要的创作出版热点现象,许多儿童文学的出版策划与创作投入,还有出版资助、研讨、宣传、评奖、推广等,都会朝着这一“热点”倾斜。可以说,主题创作、主题出版,已经成为儿童文学领域的“高频词”,堪称“现象级”的创作和出版现实。

根据童书出版家海飞先生介绍,“主题出版”已经有20年的发展过程。主题出版成为我国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类别,源于2003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的“主题出版工程”。“主题出版工程”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出版重点的出版活动。主题出版是围绕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是对党和国家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出版呈现。据开卷零售市场数据,2018年,我国主题出版新书品种3447种,零售册数在整体市场的占比为3.9%;2021年,主题出版新书品种增加到6934种,零售册数在整体市场的占比为7.7%。

主题创作是由主题出版方面的需求和引力所驱动的,也是儿童文学出版层面某种宏观调控的结果。随着近年来主题写作与出版的发展,一系列创作和出版方面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例如主题写作与出版何以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热点和一个巨大现实;怎样理解主题创作与主题出版概念、内涵;近年来这方面的创作和出版实践取得了哪些成果,出现了哪些新现象、新问题;经典儿童文学创作在主题深化上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汲取的经验和成果;面对这个时代儿童读者阅读趣味、生态、文化特征的变化,主题写作与出版应该如何更好地与儿童读者连接与对话;在已有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主题创作与主题出版如何在未来做得更好?

因此,《文艺报》开设主题创作与出版专栏,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思考和回应。本期发表李学斌教授的《新时代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隐忧与化解》。作者结合概念释义,分析了当前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认为“无论‘宏大主题’‘社会主题’,还是‘成长主题’,对儿童文学写作者和出版者而言,秉承童年本位、持守‘儿童视角’对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都至关重要”。

盼望这个栏目能够为当下火爆的“主题创作”“主题出版”把脉问诊、建言献策,让“主题创作”“主题出版”做得更好、行得更远。

——方卫平

新时代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隐忧与化解之道

□李学斌

对儿童文学创作者而言,“主题写作”是儿童文学的题中之义,但就儿童文学审美本质、创作规律而论,要将“合时”“合事”的社会功能导向的价值考量与儿童文学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创作要求相结合。原创儿童文学理应对童年文化之驳杂、“主题写作”之繁复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努力,深思慎取,并深挖开拓

当下,“主题写作”作为原创儿童文学的主流和主脉之一,不仅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包括基础教育、少儿出版、亲子阅读等在内的整个童年生态。截至目前,“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发展之快、势头之猛、成果之丰、浸淫之深,已然使之成为新时代社会生活之“现象”、童年文化之“景观”。鉴于此,从理论批评层面探讨其优劣得失不仅无可回避,而且也理应承担起儿童文学研究者自觉承担的职责。

“主题”与“主题写作”释义

首先,要厘清“主题”与“主题写作”的基本意涵。

在笔者的理解中,文艺作品的主题既是理性能力对各种自然、社会现象及其内涵的思维提炼与抽象,也是审美意识诉诸理性观念的具体呈现和形象表达。具体到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大系统的分支,其“主题”就是指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童年期的各种现象、事实、情感、体验、想象、思维,作家通过一部部、一篇篇、一首首儿童文学作品所透出来的情感态度和观念的集合。

而就主题内涵及分类看,儿童文学的主题其实是文学母题在童年文化场域中的审美细化和具体呈现。它既包括民族大义、文化传承、家国情怀等宏大主题,也涵盖生态和谐、现实参与、生活实践等社会主题,还体现亲子之爱、教育关怀、伙伴友谊等童年主题。足见,儿童文学的主题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多层意涵的类属、复数概念。

也由此,当下社会文化场域中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实际上存有“应然”和“实然”两种形态。“应然”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是广义的文学写作概念与普适性的创作实践范式,它体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化常态和内在要求,而有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存在对“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窄化”或“功利化”的“实然”理解。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文化管理等语境下的“主题”有所重合,但存在着各有所指、各归其位、各有所重的殊异之处。因此,现实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不应该将“应然”和“实然”两者互为置换,或混为一谈。

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症候”透视

在笔者看来,当下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主题出版作为原创儿童文学现实生态

之“主流”“主脉”,实际上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儿童文学主题写作顺应新时代要求,勉力讲好“中国故事”,确乎是文艺生产践行“强化国家认同、培育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文学历来有“载道”的传统,儿童文学写作聚焦“宏大主题”和“社会主题”,能集中体现原创儿童文学的文化使命和现实担当,筑牢少年儿童的精神底子和文化传承;但另一方面,现实中被曲解“窄化”和概念化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其在体现原创儿童文学社会参与意识与文化建构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繁荣。这一点应该引起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出版界的警惕。

具体而言,这种不良“症候”主要体现在观念导向、创作形态、阅读接受等几个层面。在观念导向上,一部分儿童文学写作者和出版者将“中国故事”狭义理解为“重要人物故事”“宏大主题故事”“重大社会故事”,由此,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主题出版逐渐简单化为社会政治需求和文化宣传的“风向标”和“传声筒”。鉴于上述文化语境和出版生态的浸淫、影响,在创作形态上,不少儿童文学作家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题材领域和创作方式,甚至审美追求,投身到种种“宏大主题”“社会主题”的写作大潮中,追风跟风创作频出,一时间以“抗日战争”“传统文化”“底层关怀”“乡村振兴”等社会、历史、文化事实乃至事件为内容主题的儿童文学写作蔚为壮观。这些此起彼伏的“主题写作”“主题出版”表面上为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构筑了雄伟的底座、雄浑的基调。但反过来,其中一些图书简单化地对重要主题进行图解,缺乏有效的艺术转化,同时,新时代以来的种种童年文化“新变”与童年阅读诉求,被漠视或无视,更加重了创作者对主题创作和主题出版的误解。在阅读接受层面,这种有意无意“抓大放小”“避轻就重”“舍近求远”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与“主题出版”童年文化生态中,原创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与现实少年儿童阅读诉求之间明显存在着“供”“需”之间的矛盾与错位:一方面是少年儿童不断增长、不断更新的多样文学阅读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相对单一并愈演愈烈的概念化、集约化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由此,新媒体时代文化语境下新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不同以往的生命体验、情感结构、精神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为原创儿童文学所疏于应对、漠然视之。也由此,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与新时代儿童读者之间的新一轮的文化鸿沟,正在现实语境下潜滋暗长,逐渐形成了接受隔膜。

经典儿童文学主题表达的经验与启示

实际上,“主题写作”并非什么新的写作概念或创作形态。如同“为谁言说”(读者对象)、“如何言说”(创作方式)一样,“言说什么”(创作主题)本来就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支点之一。但凡“言之有情、有物、有理、有据”的文学创作,必然都是“主题”写作。在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儿童文学中似乎不存在无“主题”的作品,就连安徒生笔下被誉为“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童话《小意达的花儿》和丹尼斯·李创作的简单拙朴、明白如话的儿童诗《进城怎么走法》,都蕴藏着“生命的游戏精神”和“儿童的原初智慧”等童年主题,更不必说其他各种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认为,相比于“主题写作”(写什么)的“广度”(内容、范围、类型)聚焦,“主题表达”(怎么写)维度之意蕴深度、思维高度、审美纯度、价值取向更为重要,更值得儿童文学写作者、出版人关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早已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范本,比如,同为“彰显战争中的童年精神”文学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以色列作家尤里·奥莱夫创作的儿童小说《鸟雀街上的孤岛》和意大利作家格莱兹、画家英诺森提创作的图画书《铁丝网上小花》体现了内容主题呈现与审美艺术表达的完美结合。再比如,同样是“顽童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捣蛋鬼万巴》《疯丫头马迪根》《小淘气尼古拉》等,以儿童不同文化语境下千姿百态的“淘气”言行,彰显了童年饱满丰沛的感知力、想象力、实践力和创造力。

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未来之路

在笔者看来,要使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和出版呈现良好态势,需要“三管齐下”:首先,无论儿童文学创作者还是出版人,都应该全面深入理解“主题”在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中的“内涵”与“旨向”。也就是从“广义”上理解“主题”,而不是“狭义”上窄化、虚化或功利化“主题”;其次,抱定“为儿童言说”“为童年立传”的立场甄别、厘定、确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主

题。此时,对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而言,时代要求的核心应该是广大少年儿童不断增长、更新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非其他。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无论宏大主题、社会主题,还是成长主题,对儿童文学写作者和出版者而言,秉承童年本位、持守儿童视角对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都至关重要。

依我的理解,在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中,童年本位、儿童视角的价值至少有三:其一,童年本位、儿童视角可以强化作品中的儿童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让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场景、现象、人事成为儿童生命成长的有机成分;其二,童年本位、儿童视角可以将社会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和历史语境进行符合儿童阅读心理的审美化、艺术化处理,增进儿童读者对文本主题、情节内容的接受、认同;其三,童年本位、儿童视角可以在作品中构建成人/儿童双视点,也由此形成“儿童—成人”审美对话,进而丰富作品内容结构,深化作品主旨表达,使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多层次、复合性审美效应。

而具体到主题写作中儿童文学作品童年本位、儿童视角的呈现方式,则取决于内容结构、主题定位、素材基础、形式选择等诸多要素,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形成具体路径,没有“包打天下”永恒、统一的方法、妙诀。

21世纪是创新时代。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承前启后、锐意开拓的创新与创造。当下,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进入深化阶段。当生命科学在蛋白质设计、脑机对接、基因重组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当绘画、音乐、影视、动漫等童年文化类型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升级;当生成式AI已悄然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立足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方向究竟该如何确定?原创儿童文学写作的发展空间究竟在哪里?儿童文学审美突破、文化创新的路径又该如何延展、开拓?这些问题理应承担起儿童文学界、理论评论界和少儿出版界的关注与思考。无论如何,对儿童文学创作者而言,“主题写作”是儿童文学的题中之义,但就儿童文学审美本质、创作规律而论,要将“合时”“合事”的社会功能导向的价值考量与儿童文学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创作要求相结合。原创儿童文学理应对童年文化之驳杂、“主题写作”之繁复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努力,深思慎取,并深挖开拓。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关注

特别有意思的“说话”谋略

——探读“微寓言”的东方美学意味

□班 马

“说”个“话”,还要“谋略”?至于吗?那是必须的。今天,人工智能就用“语言”来“搞”我们人类。

“语言”真是不得了,据说,它是我们人类的文明之根,所以被ChatGPT掌握了去,来同我们“对话”,并“说”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此时此刻,我正在思考,如果给机器人喂进全世界的“寓言”,那将会是何种景象:龟兔、鹬蚌、在船板上刻一把剑,狐狸、葡萄、酒杯里的一条假蛇,一支矛和一只盾两件兵器在斗嘴,庄子、伊索,一只呆兔撞昏在树下结果引来一个傻瓜……倘若,我给这个机器大模型发一条指令,“只能用一行字”来回答,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换言之,中国人的“言外之意”,到底能不能“搞懂”语言大模型?我们不妨用“寓言”来玩玩。

讲道理,怎么只说一句话?

作家、学者孙建江在儿童文学、寓言等领域多有建树,他笔下的“一句话微寓言”承袭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对“矛盾”的解读,常常以现

代日常生活为背景,言简意赅,有时一句话即可道出发生在身边却没有意识到的哲学意涵,这种文字简约之美,让人过目不忘。其“一句话微寓言”在日本被称作“中国一口寓言”,探究其内涵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则:

扩音器

阁下执意问是不是原声,我只能说:是,又不是。这个回答您满意吗?

这则寓言有声有色,有人有物,还有说不清的情绪。我想了半天,结果竟还是想到了人工智能。字短意长,先给出一个“东西”或一个“梗”,抛出一个“题”,然后“借题”发挥,让我们在—怔—之际的思维张力之时,获得了“人类说话”的东方“言外之意”。这种寓言精神“背后”的含义动感十足,具有“架空”一代的思维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寓言,其实不是一种“好好说话”的正常语言方式。有时候是正话反说,有时候是似是而非、引人猜测,有时候是摆下一个“故事”来“兜着圈子”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寓言的说话方式都

很“可爱”,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寓言之盛恰在战争、外交、流派辩论、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中。中国古代更看重这一种东方的“说话方式”:一个大使级的人物孤身进入敌国,对大王说了一个“故事”;静观政治风暴的庄子突然说起山中“大树”;引颈自刎的志士在剑下讲述了某种植物的生长史,被对方慨而松绑并拜为上座。我在读到《战国策》之中以寓言当面讽谏大王之际,不禁哑然失笑,但见“王顾左右而言他”。《伊索寓言》也是如此,那只要吃小羊的狼,为什么在下嘴之前还要“说”那么多的“话”?

微寓言里面,有着正宗的东方精神,见人见事,言之有物;有着好玩的“游戏”语言,也有关“寓言”与“天下”;既是一个个生动的“场景”,也是站立在当代语境下的譬喻与警示。

走向极简,可能是理论家的实践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奉小说为主流”的发展道路,我认为,所有秉持和切入诸如“寓言”“儿歌”“童话”“戏剧”(游戏)“绕口令”(游艺)等角度来进入儿童文学的,才

是正宗和纯正的儿童文学美学特质。

1987年,孙建江的论作《寓言的矛盾特质》发表于《儿童文学研究》,那时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美学建设的高峰期。该作将“寓言”的理论思维带入儿童文学研究界,具有关于儿童文学原声价值的纯正定位,对于当代中国“寓言”及“寓言学”有着重要意义。

重读这篇早期“寓言论述”,也令我重回那个美学、思辨与充满探研精神的时代。他的文章中有一种扎扎实实、层层递进、逻辑相扣的,有如学科建设般的试图“完形”和“自构”的认真劲头。“微寓言”探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有益尝试,以一个“标题”、一行“文本”的极简方式说话,用“笑而不答”的隐喻、偈语式的“短句”切入寓言之体。将矛与盾、阴与阳、正与反等世间皆为“相倚”的关系在一行文本中进行对照,以幽默、风趣的游戏语言博纳“万物”,让人读到“微寓言”的“大千世界”。

“说话”,也是一种中国智慧

中国人特别的“说话方式”是一种东方式

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故意或特意留下大片“空白”的“短语”,那正是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禅句、偈语、及至古典诗词的那种“东方智慧”或“东方神秘”的重要落点。

寓言的本质并不一定连接的是“诗”的精神,可能是深深地连接着现实人生、世间可触的“实物”。寓言,寓“物”而言,物我两忘。在物我对话中,微寓言极致地凸显了这种“物语”的深刻内涵。

最为西方喜爱的唐诗之一是讲中国古人“说话方式”的李白的《山中问答》,其中的“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蕴含着极具趣味的东方美学。如果用这种“笑而不答”来与人工智能对话,很可能让“语言大模型”感到无所适从。东方少年可以在“说话方式”“言语能力”“语言智慧”方面,有意识地领悟一点“东方的隐喻”美学取向。寓言,显然正是一种善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自问自答形式游戏的文体,充满极有意思的“对话谋略”的微寓言,不失为一种践行东方美学的儿童文学写作范式。

“说话”,也是一种中国智慧。